

随着青壮年外出务工，农村孩子进城上学已成为趋势，但也因此割断了农村的文化脉络，使孩子们对乡村传统美德和文化越来越陌生——

“空心”的村小 留不住的乡愁



村寂少童音

李明画

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乡土文化的凋敝。

村小撤并留下“寂静村庄”

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栖凤渡镇正源村小是“撤点并校”的产物。2009年，区教育局将这所服务2000多名村民的村小关停，到5公里外的原廖王坪乡中心小学就读。目前，这所原乡中心校有600多名学生，2012年撤乡后学生在逐年减少。

老教师李桥林还记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自己在正源村小当民办教师时，村子里人气很旺，村民们大多在耕田种地。每到农闲时节，就会有三三两两的村民来到学校，或与老师们谈谈孩子的在校表现，请教老师回家如何指导孩子，或与老师们讲讲奇闻趣事。

目前，笔者回了一趟湖南老家，发现一些村里的文化生活过于贫乏：村民们没事不是呆在村口的小卖部打麻将，就是三五成群泡在别人家打牌、玩扑克，在“双抢”的农忙时节，有的人也不例外。

笔者走进自己曾就读过的村小，看到校园里杂草丛生，那幢三层高的教学楼玻璃窗全碎了，露出一个个不规则的大洞小洞……

笔者家乡小学只是一个缩影。据媒体报道，从山西、宁夏，到重庆、福建、湖南……一场乡村小学“减员潮”正在加速度席卷全国，“空心校”正在大量涌现。“撤点并校”虽然从总体上有利于教育质量的提升，不过也在一

事，聊国家大事；或与老师们聚在一起下象棋、打扑克……学校成了村民们心中的文化中心。

在李桥林的记忆中，那时，村民尊敬老师，老师也是全心全意为孩子们教好书，学校有什么事情，村民们知道后不用招呼就赶过来了。

李桥林告诉笔者，“本世纪初，作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主要来源的教育费附加和教育集资被取消，当时国家教育投入机制没有相应地建立起来，导致农村教育经费不足，办学条件难以保障。撤并后的村小没了活蹦乱跳的读书郎，没了知书达理的老师，一些地方通过中小学布局调整集中办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轻财政压力，成为政府的一种自然选择。”

以苏山区原廖王坪乡为例，2000年前有8所村小，一所中心小学，一所初中；到2009年时，全乡仅保留一所中心小学，初中搬并到郴州市十二中。村小消失，妇女陪读，青壮年外出务工，该乡的许多村庄民老龄化态势十分严重，只有到寒暑假期间，才听到孩子们的嬉戏声，村庄逐渐失去了生命力与活力，沦为不闻童子声的“寂静村庄”。

乡村文化正在逐渐衰落

面对日益消逝的村小，许多村民及教育工作者无不为此感到惆怅和惋惜。

近年来，全国“十佳师德标兵”盘振玉明显感觉到，老师和村民们之间的疏离感在加剧，有的村小逐渐沦为农村社会的一方“孤岛”。许多村民外出务工陆续发家致富，农村教师则依然清贫度日，两者的价值取向也渐行渐远。如今，农村老师很少走村串户，搞家访的也少了，学校和村民已近乎两条没有交集的平行线。

2007年，由一家爱心企业捐款援建，设施完善，建造标准较高的五马垅村小，随着学生数量人数的不断减少，加之这里山高路陡，不适宜人们居住，扶贫攻坚任务繁重，2012年，村里400多个瑶族同胞整体搬迁到山下居住，盘振玉所在的村小也随之撤并。现在，村小已完全荒废，变成了林场的一个看护点。

“在村小就读的孩子，家庭条件都比较差，也有一些家长认为孩子学习不好，在村小将就学了。”盘振玉说，村民的钱袋子一天天鼓起来，老师们却显得有点清贫，不再受人尊重，往日热闹的学校也逐渐无人问津。

一辈子献身山区教育，对学校和农村社会关系的变迁，盘振玉有着独特的洞察和切身的体会。

“以往，每到农忙时节，村小都要放几天农忙假，让孩子们回家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如今，村小与城区学校一样，除了上课还是上课。教育对农村来说，并不是单纯的教书育人。其实，一所村小就是当地的一个文化高地。随着学生大量离开农村，进城上学已成为热潮，却因此割断了农村的文化脉络。”盘振玉观察到，如今的农村，能工巧匠越来越多，文化人才却越来越少，村民腰包越来越鼓，休闲方式却越来越少；楼房越盖越多，文化场所却越来越少。随着村小的消失，农村文化的高地不在，大量的中青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村的疏离感逐渐增强，使农村文化活动失去了中坚力量和新鲜血液，村庄后继乏人，绵延千百年的农村文化面临传承及拓展危机。

提振村小重构乡村文化

“如今村集体经济壮大了，基础设施改善了，村里可以给村民买社保、买医保，但唯一无能为力的，就是为村民提供不了高质量的

教育！”郴州市苏仙区飞天山镇白溪村文书曹晓毛说。

曹晓毛坦承，现在，原有的村庄文化流失了，原有的村庄特色丢失了，原有的文化底蕴也在消失。村民仅有的文化活动，要么是坐在麻将桌上，要么就窝在电视机前，即使逢年过节，过去那些玩龙灯、划龙船、踩高跷、说鼓书、唱皮影戏等文娱活动也几乎销声匿迹了。

郴州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科长陈庆通过对自己的见解：“学校如果远离了村庄，乡土文化就缺少传承。以往，农村所发生的事情都会影响到学校师生；如今，村小的远离，使得孩子们对乡村传统美德和文化越来越陌生。”

对此，他认为：首先，农村学校的布局调整与优化，既要考虑人口变动与迁移趋势，又要考虑人口增加趋势，科学布局，规划新建一批标准化的中小学校，让村小成为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课余时间向农村居民开放青少年活动中心等，使村小在文化普及、科技传播、文明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其次，村小的衰落，让家庭教育有所缺失的村民，往往将希望投诸学校。但村小的没落让这条教育之途变得曲折莫测，应充分考虑乡村文化缺失带来的不利因素，有人群的地方就应该有教育，家庭教育主要培养孩子的性情和品格，学校和课堂教育主要是传授知识和技能。村小或教学点的撤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乡村文化的流失。

再次，农村输出一批又一批人才，但少有人回来。农村子弟不再“落叶归根”，而农村也很难吸引到城市人才，这就让乡土文化呈现出了某种虚空状态。国家应将优质教育资源进一步向农村倾斜，出台优惠政策，为农村留住文化“绿洲”。



“母子”夏令营

近日，来自重庆市各区县的40对困境儿童和“爱心妈妈”代表在重庆歌乐山天池户外拓展训练基地参加夏令营活动。该活动由重庆市妇联组织举办。新华社记者 唐奕 摄

教育部出台规定 严处学术不端

本报讯(记者于忠宁)为维护学术诚信，促进学术创新和发展，教育部日前颁布《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自2016年9月1日起施行。《办法》是教育部第一次以部门规章的形式对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做出规定。

《办法》明确了高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的主体责任；突出了以预防为主，教育与惩戒相结合的原则；明确了学术不端的六类情形，包括：剽窃、抄袭、侵占他人学术成果，篡改他人研究成果，伪造数据或捏造事实，不当署名，提供虚假学术信息，买卖或代写论文等。同时授权高等学校可以结合学校实际，自行规定六类之外的学术不端情形。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对待学术不端行为，教育部及各高校的态度历来是“零容忍”。由于学术不端行为的预防和处理复杂性、综合性很强，极大地制约了学术不端行为的有效治理。为此，《办法》对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的工作机制、工作原则、预防措施、学术不端行为的类型、学术不端案件的受理、调查、认定、处理、救济与监督等内容做了全面规定。

《办法》明确规定，高等学校是学术不端行为预防与处理的主体。高校应当建立集教育、预防、监督、惩治于一体的学术诚信体系。在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理方式上，《办法》规定高等学校可依据性质和情节轻重，对责任人给予辞退(解聘)或撤职、开除等处理。有关当事人对处理结果不服的，可以提出异议或申请复核。针对实践中可能存在的查处不力、隐瞒包庇、处理不公等问题，《办法》规定主管部门会直接组织查处，造成恶劣影响的还要追究学校相关领导责任。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认为，《办法》突出了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促进高校自主发展、自我监督的原则。

该负责人称，新修订的《高等教育法》特别强调了高校学术委员会在调查、认定学术不端行为方面的职责。根据职责分工，学术委员会依法负责调查、认定学术不端行为；高校应当根据学术委员会的认定结论和处理建议，结合行为性质和情节轻重，依职权和规定程序对学术不端行为责任人作出相应处理。这样的设计旨在体现学校内学术权与行政权的分离，从而避免行政对学术事务的不当干预。

《办法》还规定，高等学校为获得相关利益，有组织实施学术不端行为的，主管部门调查确认后，应当撤销高等学校由此获得的相关权利、项目以及其他利益，并追究学校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人的责任。

消协提醒暑期培训注意防骗

新华社电(记者王劲玉)暑假期间，各类科目补习班、夏令营培训班层出不穷，其中不少存在课时缩水、随意拼班、收取费用不透明等问题，引发消费纠纷。山西省消费者协会提醒广大家长和学生，报名暑期培训要仔细辨别，防止落入培训陷阱。

消协提醒，一要了解培训班是否正规。培训班是否经有关部门批准，特别要看清办学许可证上规定的地点、范围、内容是否与实际相符合。有些培训班喜欢打着名校、名师的名义进行宣传，家长们应注意核实情况，最好到授课地点实际查看一番，对场地简陋、教具不齐全的培训班更应多留心。

此外，要保留培训相关证据，注意相关协议、收费单据等是否为有效凭证，凭证上收费单位与实际办学单位是否相符，以防上当受骗。

科教时评

给就业率挤水分该对症下药

率的比拼，随着高校招生大战越来越趋于白热化，就业率就成了许多高校，特别是一些生源本已紧张的高校的“生命线”。

在一些高校负责人眼里，毕业生的就业率是个硬指标，它关系到经费和许多资源分配问题，来年的招生指标、学校声誉乃至财政拨款都和毕业生就业率挂钩，教育部在审核新增硕士、博士学位授予单位时，包括审核新增学位授权点时，就业率也都是重要依据。某些高校实际就业数据可能很寒碜，所以存在虚报数字的冲动。接踵而来的高校毕业生就业率“掺水”的做法，让就业率的可信度大打折扣，缺乏应有的公信力。问题症结就在于，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统计到目前为止，都是由学校自己出具证明，而这种做法并不一定科学，也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

因为就业率的高低往往关系到学校的生存发展，所以一些高校在就业率上做手脚，玩猫腻也就在所难免了。

应该说，教育行政部门要求公布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本意是好的，目的是为了让各家高校所设的专业更接近市场需求。但令人遗憾的是，一些高校将就业率当成了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将招生与就业率挂钩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走了样，有悖于政策设计者的初衷。

应该说，教育行政部门的本意是好的，目的是为了让各家高校所设的专业更接近市场需求。但令人遗憾的是，一些高校将就业率当成了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将招生与就业率挂钩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走了样，有悖于政策设计者的初衷。

诸如此类掺水的就业率，其实并无多大实际意义。要知道，这种弄虚作假的做法，其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它助长浮夸虚报之风，让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大行其道。某些高校在就业率上瞒天过海的做法，不仅让自身的诚信大打折扣，也难以让学生以健康的心态走向社会；另一方面，此类就业率，不仅掩盖了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真实性，侵害了社会公众的知情权，而且也影响到教育行政部门统计数据的真实性，无疑给上级机关决策带来不可回避的负面影响。

有鉴于此，教育主管部门有必要制订出更为适当的就业评估体系，真实地反映出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和就业率的“含金量”。此外，

还要提高高校就业质量造假行为的违规成本，不能只是不痛不痒地通报批评。惩处设限上了，就业率的水分自然也就少了。

“被就业”政绩

漫画 李法明

香港学子
体验历史文化

7月20日，在倾盆大雨中，来自香港的青年学子们兴致勃勃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拍照留念。近日，由香港新家园协会和北京青年联合会共同组织的“四海一家”中华历史文化体验之旅在京举行，来自香港的1000余名青年少年和北京的500余名青年参加。

本报记者许之丰摄

传统专业出现预警 绿色专业受到热捧

职业教育也要随“生态”前行

□本报记者 李丰 实习生 石灿

7月7日，贵州省教育厅公布了该省高校2016年5个本科预警专业，其中包括矿物资源工程专业、工程管理等专业。业内人士分析，这与贵州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引发的技术变革、职业变革不无关系。那么，在生态文明发展进程中，职业教育究竟该如何办？7月，在贵州召开的2016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上，众多国内外专家各抒己见，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讨论。

“产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我们就培养什么样的人。”

在“职业教育和生态文明”主题论坛上，贵州省教育厅督学邹联克发言提到，贵州职业教育专业设置和增加绿色的内容，设计与大生态、大旅游、大健康、大数据、新医药和新农业等绿色教育相配套的教学内容，在职业院校的专业设计上，我们现在紧扣产业发展，按照现实需要，对一些传统专业进行调整，并且根据贵州重大战略决策来设置我们职业教育专业。

而在新专业申报上面，贵州省教育厅要求，各高校要按照需求导向、条件保障、规模适度、持续建设的原则制定专业建设规划，做到专业建设“既做加法，又做减法”，对于确属培养数量超过社会需求、办学条件不足、教学质量低下的专业，要减少招生规模，暂停招生或撤销专业。各校申请备案新专业时，对列入预警的专业原则上不予受理。

“产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我们就培养什么样的人，不论某个专业的招生人数是否

在减少，它都符合其中某一种需要，如果不根据市场和产业的需要来设置专业、培养人才，学生数量越多，浪费就越大。”邹联克说道。

“我们职业教育在扶贫、脱贫上主要是输血和造血。”邹联克介绍，贵州在职业教育的脱贫上，实施了“五个精准”：一是精准招生，二是精准资助，三是精准培养，四是精准就业，五是精准培训。通过这“五个精准”让需要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都能接受教育，而且让学生能够接受良好的职业教育。

扶贫仍然是贵州实现全面发展的一项非常关键的任务，在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工作当中，贵州省采用了针对贫困家庭由职业院校来实行订单式的培训模式，贵州省属10所学校，一年向部分贫困县招2000人，3年培养6000人，实行全免费。同时，政府遴选100所职业院校挂牌建设扶贫基地。进村入户培训、工学结合订单培养，施行“培训→实践→再培训→再实践+创业辅导”、“研学产销”一体化、农业技能“师带徒”等培训模式。

教师质量是办好教育的关键

近年来，贵州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数量和质量显著提升。据统计，贵州省中职招生连续三年超过30万人，在校生人数由2012年的50万人增至2015年的85万人。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杨秀英认为，“不论是生态文明，还是可持续发展，它的核心要素是人，在我们培养职业技术人才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核心是教师。”

但目前，职业教育教师普遍存在知识单一、老化、实践经验及实际技能缺乏的问题，

这对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很不利。“教师要对他自己所持的教学能力有所了解和掌握，并付诸充分的工作实践，如果一个教师连自己的能力都不了解，这势必会对教学质量有所牵制。”德国汉斯·赛德尔基金会驻上海专家邵贝德博士强调，“老师有什么样的能力，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某个行业的能力。”

据杨秀英介绍，自2002年开始，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开始把该校在职业教育方面的教学经验，包括贵州在内的西部省份职业教育学校的教师进行分享，“我们主要目的在于把一个‘先天不足’的教师培养成为一个具有职业性的教师，而他们最欠缺的是专业实践能力。”为此，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通过量身定制的方式，为参与交流分享的教师设置了不同专业领域的相应知识培训。

另一方面，杨秀英建议学校要制定符合社会和教师发展的政策，鼓励教师进行自发性的学习和发展，不断地主动和企业、研究机构多方沟通，建立灵活的人才流动机制。校企双方共同制订双向挂职锻炼、横向联合技术研发、专业建设的激励制度和考核奖励制度。

要从学历教育转变为面向全社会的培训

“生态文明是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方法论。职业教育的发展，需要运用生态学的思想科学分析职业教育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并进行科学的定位，提升职业教育的自适应性和自组织能力，积极发挥职业教育的优势与特点。”贵州广播电视台大学校长李院在本

次论坛中认为。

在李院看来，实现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首先要树立职业教育生态观，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解决职业教育发展问题，指导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其次，要构建有利于职业教育发展的社会环境，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教育理念，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加大职业教育投入；第三就是要坚持多样性，确保不同教育类型发展。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继续教育共同形成合理的层次结构，相互依赖、彼此影响才能构建好终身教育“立交桥”。

德国汉斯·赛德尔基金会总干事长维特劳夫也认为，中德两国现在都日益地更加依赖于有素质、有创造力的劳动者，也热衷于节约自然资源的方法。然而，如果仅仅只依靠高素质、有创造力的劳动者并不足以拯救地球上有限的资源。“所以我们通过可持续发展教育，以全面改变这种心态是必要的。”通过职业教育，把个体合为集体，共同参与构建一个更为美好的社会。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副所长刘立新则提醒道，目前我国出现了快速老龄化的现象，劳动力人口减少在急剧减少，在这种背景下，一定要通过职业教育，把现有劳动力资源盘活，把现有劳动力的劳动生产贡献能力提高。在这方面他建议，职业教育首先要改变以培养青少年、学历教育为主的现状，应进一步扩大面向全社会各种各样的培训，提高成年劳动力的技能水平，促进就业。其次，要想办法提高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吸引青少年选择职业教育。